

例 2.1：睡帽和汽车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商人为了打开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而欣喜若狂。当时英国棉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的商人估计，中国有 4 亿人，假如有 1 亿人晚上戴睡帽，每人每年用两顶，整个曼彻斯特的棉纺厂日夜加班也不够，何况还要做衣服呢！于是他们把大量洋布运到中国。结果与他们的梦想相反，中国人没有戴睡帽的习惯，衣服也用自产的丝绸或土布，洋布根本卖不出去。

1999 年 6 月的上海车展是在上海少有的漫长雨季中进行的，参观者人头攒动，但看得多，买的少。在私人汽车最大的市场北京，作为晴雨表的北方汽车交易市场，该年上半年的销售量只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1/3。尽管当年全国轿车产量可达 75 万辆，但一季度销售量不过 11.7 万辆。面对这种局面，汽车厂家一片哀鸣。

睡帽的故事说明有支付能力但没有购买欲望不能算是需求，汽车的故事说明有购买欲望但没有支付能力也不能称为需求。

例 2.2：违背需求定理的丝绸产品

丝绸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象征，丝绸产品也是中国传统的大宗出口产品，曾出口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前，中国的丝绸产品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都非常热销，意大利的上层社会把其作为富有和身份的象征；但是 80 年代末以后，随着中国乡镇丝绸企业的崛起，大量廉价的丝绸产品充斥意大利市场，上层社会就失去了对中国丝绸产品的兴趣；由于丝绸的清洗保养相对较难，一般消费者也不喜欢纯丝绸产品，于是商人们发现，丝绸产品的价格低廉了，需求量反而下降了。因此，一般认为，当时的中国丝绸产品在意大利市场上具有向右上方倾斜的需求曲线。

例 2.3：互补的数码相机与数码冲印

数码冲印是将数码相机的文档转换成传统照片的冲印技术，随着数码相机的畅销和普遍使用，数码冲印发展迅猛。2002 年初杭州市只有三家公司提供数码业务，到 2003 年初已变成了 20 家，数码冲印设备的价格从 180 万元跌到 100 万元，一张 5 吋照片的冲印费用也从 2 元跌到了 0.7 元。与此同时，由于数码相机价格一路下跌，数码冲印业务量暴涨。

例 2.4：“三大件” 50 年三大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生活用品的档次不断提高，品种日益繁多。“单车、手表、缝纫机、尼龙蚊帐、绣花被”曾经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国新嫁娘最为眼热的时尚。那时，“永久”、“凤凰”、“飞鸽”单车、“无敌”缝纫机都是紧俏物资，要票证才能买到。然而，到 80 年代末，几乎人手一表，自行车已很普遍，摩托车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缝纫机则在短缺了 20 余年后，从市场上迅速饱和后就被淘汰了，购买成衣、时装成为主流。彩电、冰箱、洗衣机是 80 年代的新三件，彩电难买也曾贯穿整个 80 年代。但是，进入 90 年代，先是完成了彩色电视机代替黑白电视机的过程，接着录像机代替了录音机，影碟机又代替了录像机。空调器、热水器、微波炉、家用电脑进入寻常百姓家。长期以来能代表身

份地位的电话开始进入普通人家。“三大件”用语用得越来越少，每个家庭的电器数量早已突破“三大件”。至今，一户中拥有两三台电视机的不在少数，一户中拥有电话、传呼、手机的也不在少数。可以说，大屏幕彩电、空调、电脑已成为当今流行的新“三大件”，当然，不少家庭已拥有了更现代的“三大件”，即一套自己的住房、上网电脑和家庭轿车。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总是不断地通过其消费的商品和劳务来体现。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一些原先消费的正常商品逐渐变成了低档商品，而一些原先根本不可能消费的商品和劳务变成了正常商品。人们收入水平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在不断地把某些商品变成低档商品，而把另一些商品变成正常商品的更迭过程中实现的。事实上，在人们的吃、穿、住、用、行等方面无不体现着这一变化。

例 2.5：预期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1988 年夏天，我国将进行“价格闯关”的种种传闻出现后，人们预测各种商品会全面涨价，触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潮。一时间，象皮茄克、鸭绒被、毛毯等冬令商品也伴着赤日炎炎的盛夏汗水淌出了商店，流进了千家万户。甚至不制冷的电冰箱，不摇头的电风扇和漏水的洗衣机也被抢购一空，还出现一家抢购几百公斤食盐的奇闻。但是经过 1988 年的抢购风潮，人们汲取了经验和教训，认识到我国物价改革是在稳步而合理地进行，因此，在以后的物价改革中，尽管 1994 年物价水平上涨率达 21.3%，但人们对价格的预期心理是稳定的，没有出现大的抢购风潮。

1997 年以来，尽管我国的物价水平上涨率为负，但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一直持续到现在。引起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收支预期是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企业体制改革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就业压力，使城乡居民就业稳定性减弱，再就业困难加大，与就业直接相关的收入不乐观。同时，社会各阶层收入结构中，工资等持久性收入比重减少，其他临时性收入比重增加，从而居民对未来不能形成可靠的收入预期。另一方面，居民对自己承担的改革成本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程度预期不明，同时住房商品化、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使得人们预期未来的支出增加。因此，体制性变革、新旧体制的磨擦导致居民产生的紧缩消费、增加储蓄的预防心理没有根本性转变，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难以启动也就是必然的了。

例 2.6：医疗保健定价

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提供有医疗保健补贴，并向消费者收取一部分费用用以弥补部分医疗服务的成本。如果一个国家提高医疗保健定价，这对穷困家庭和富有家庭有何影响？在非洲的象牙海岸，穷困家庭对医院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为 0.47，而富有家庭为 0.29。这意味着如果医疗服务的定价上升 10%，将使穷困家庭的医疗保健减少 4.7%，而富有家庭则减少 2.9%。在秘鲁，穷困家庭和富有家庭之间需求弹性的差距更大：分别为 0.67 和 0.03。因此，由于穷人对价格更为敏感，当价格上升时，他们的医疗保健将有更大的减少。

例 2.7：富有弹性的电话市场

在中国电信市场上，电话用户及其电话业务的价格弹性非常大，价格的降低对于刺激用户数量和话务量的增长具有极大的作用。以 1999 年的电信资费调整为例，当时固定电话初装费由平均每部 1010 元下降到 725 元；移动电话入网费由每部 800 元下调到 500 元。在降价的刺激下，当年的 3 月至 6 月，全国就新增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用户 1050 万户。按平均每部电话年支付费用 1000 元计算，短短 4 个月可以扩大中国电信市场消费达 100 多亿元。而 2001 年 7 月 1 日，国家财政部、产业信息部联合发文取消初装费后，全

各地的电话装机用户大幅度上升。仅当年7月份一个月，北京市就有13万用户申请安装电话，平均每天有5000用户在申请装机，相当于以前4个多月的申请量。而在杭州，取消电话初装费两个多月后，杭州的电话市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及农村市场也出现了空前的火爆场面。每天前往电信部门登记装电话的客户络绎不绝，最高一天甚至超过以前一天登记数的10倍。萧山区甚至出现了一个月发展农村电话2.7万户的高峰，一个月新装电话农户就超过以往一年的数量。淳安县也出现了一天受理装机1485部的场面。

例 2.8：新技术与新产品

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够观察到许多商品，如电视机、空调、冰箱、计算机、计算器、手机、电子表等，近十多年来，销售量成倍上升，但价格却一直在下降。为什么这些商品的质量越来越好，价格却越来越低？主要是因为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在不断下降。那么为什么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会不断下降呢？那是因为这些行业都是技术进步很快的行业，而技术进步可以降低产品生产的成本。

以袖珍计算器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初，它还是高科技产品，生产成本很高，价格很贵，数量也很少。到了80年代，它已经变成了成熟产品，技术进步使其成本大幅度下降，相应的产量增加，价格也下降。到了90年代以后，袖珍计算器已经被当作工艺简单的小玩意，一款精巧而实用的计算器，已经能够非常廉价的购买到。

再以手机为例，在中国，1994拥有一款体积庞大的“大哥大”，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当时一款现在看来非常笨拙的移动电话，价格高达2万元，是绝对的奢侈品，能够买得起这样手机的人寥寥无几。然而，十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走在大街上时，满目看到的都是挂着、拿着手机的人，对于许多人来说，手机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必需品。手机的外观越来越小巧，造型越来越漂亮，手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手机的价格越来越低。同时款式层出不穷，更新换代十分迅速。一款新推出的手机价格5000元，但是，半年后的价格可能已经下降到2000元。如果你不在乎手机款式，几百元就可以买到一款不错的手机。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就是日益更新的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是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导致了手机的质量不断提高，数量不断增加，价格不断下降。

例 2.9：城市住房的价格为什么上涨？彩电的价格为什么下降？

城市住房的价格由住房的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如图2-20（a）中，需求曲线 D_0 和原供给曲线 S_0 决定的市场均衡处于 E_0 点，此时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分别为 P_0 和 Q_0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人数增加，对城市住房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从而住房的需求曲线大幅度向右移动至 D_1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住房的供给增加，供给曲线也向右移动至 S_1 。由于需求增加的幅度大于供给增加的幅度，或者说，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的幅度大于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的幅度，新的均衡点 E_1 决定的均衡价格 P_1 上升了，均衡数量 Q_1 增加了。

彩电的价格也由彩电的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如图2-20（b）中，需求曲线 D_0 和原供给曲线 S_0 决定的市场均衡处于 E_0 点，此时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分别为 P_0 和 Q_0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使得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彩电的需求不断增加，相应地，彩电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至 D_1 ；与此同时，随着技术进步，体制放宽，彩电的供给大幅度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至 S_1 。由于供给增加的幅度大于需求增加的幅度，或者说，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的幅度大于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的幅度，新的均衡点 E_1 决定的均衡价格 P_1 下降了，均衡数量 Q_1 增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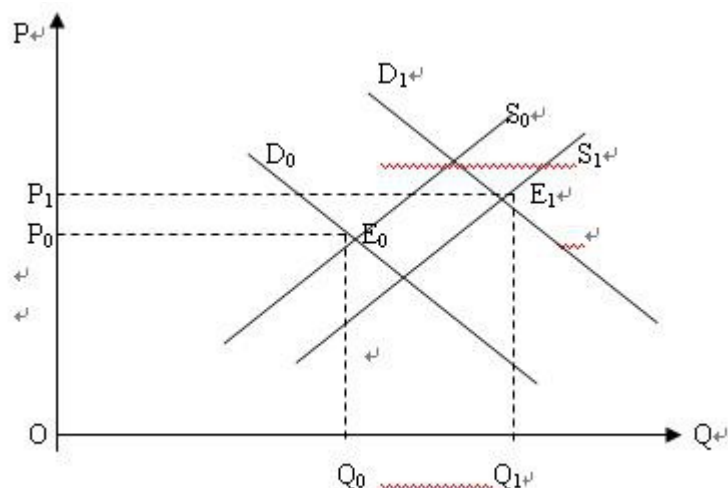


图 2-20 (a) 城市住房的价格为什么上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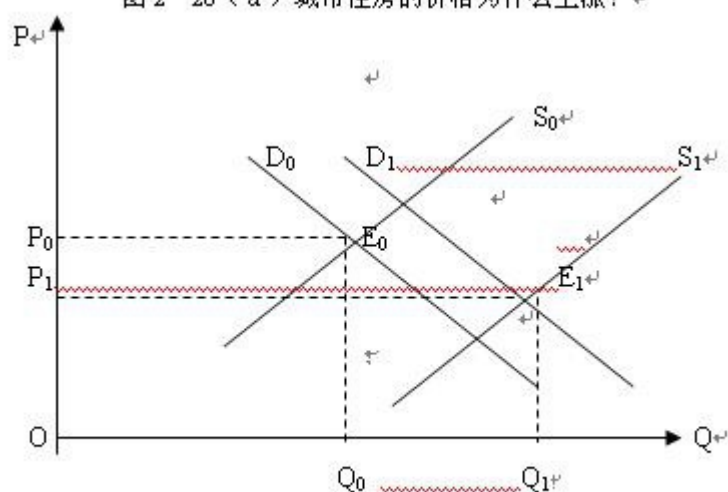


图 2-20 (b) 彩电的价格为什么下降？

例 2.10：谷贱伤农的经济学分析

谷贱伤农是我国流传甚广的一句成语，意思是粮食丰收了，农户的收入却反而减少了。推而广之，农业的好消息会是农民的坏消息吗？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它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如果让粮食的价格和产量由自发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则会存在谷贱伤农的情况，如图 2-2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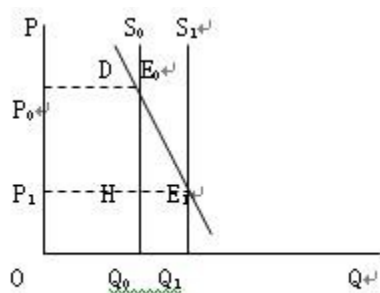


图 2-21 谷贱伤农的经济模型

在图 2-21 中，对于有生产周期的粮食，在一定的生产周期内粮食产量是一个常数，因此，粮食的供

给曲线是一条垂线。假设上一年的粮食产量为 Q_0 ，对应的均衡价格为 P_0 。本年度粮食丰收后，供给曲线从 S_0 右移至 S_1 ，均衡价格下降至 P_1 。由于粮食丰收增加的收入为四边形 $Q_0Q_1E_1H$ 的面积，而由于粮价下降减少的收入为四边形 POP_1HE_0 的面积。显然减少的收入大于增加的收入，因此，粮食丰收后农民的收入反而减少了。这就是平常所说的“谷贱伤农”，也就是所谓的丰产不丰收的道理。

例 2.11：OPEC 和石油价格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成员决定提高世界石油价格，以增加它们的收入。这些国家通过共同减少它们提供的石油产量而实现了这个目标。从 1973 年到 1974 年，石油价格上升了 50% 以上。几年之后欧佩克又一次合作，1979 年石油价格上升了 14%，随后 1980 年上升了 34%，1981 年又上升了 34%。

但是欧佩克发现维持高价格是困难的。从 1982 年到 1985 年，石油价格连续每年下降 10% 左右。1986 年欧佩克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完全破裂了，石油价格猛跌了 45%。

这个事件表明，供给和需求在短期与长期中的状况是不同的。在短期中，石油的供给和需求都是较为缺乏弹性的。供给缺乏弹性是因为购买石油贮藏量和石油开采能力不能迅速改变。需求缺乏弹性是因为购买习惯不会立即对价格变动作出反应。例如，许多老式耗油车的驾驶员只有支付高价格的油钱。因此，如图 2-22 (a) 所示，短期供给曲线和短期需求曲线是陡峭的。当石油供给从 S_0 移动到 S_1 时，价格从 P_0 到 P_1 的上升幅度是大的。

长期中的情况非常不同。在长期中，欧佩克以外的石油生产者对高价格的反应是增加石油勘探并建立新的开采能力。消费者的反应是更为节俭，例如用新型节油车代替老式耗油的汽车。因此，正如图 2-22 (b) 中所示，长期供给曲线和长期需求曲线都更富有弹性。在长期中，供给曲线从 S_0 移动到 S_1 时所引起的价格变动小得多。

这种分析表明，为什么欧佩克只在短期中成功地保持了石油高价格。当欧佩克各国一致同意减少他们的石油生产时，它们使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尽管每个欧佩克成员国销售的石油少了，但短期内价格上升如此之高，以至于欧佩克的收入增加了，与此相比，在长期中，当供给和需求较为富有弹性时，用供给曲线水平移动来衡量的同样供给减少只引起价格小幅度上升。因此，这证明了欧佩克共同减少供给在长期中并无利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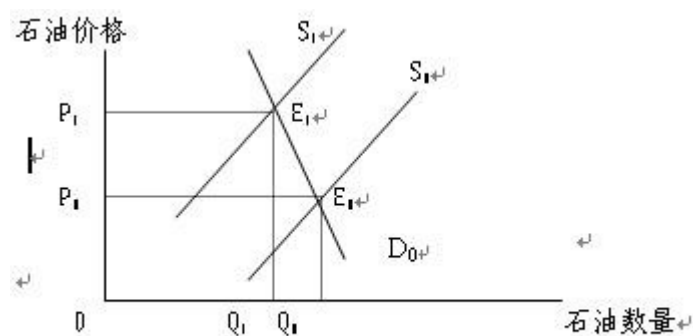


图 2-22 (a) 欧佩克短期内的合作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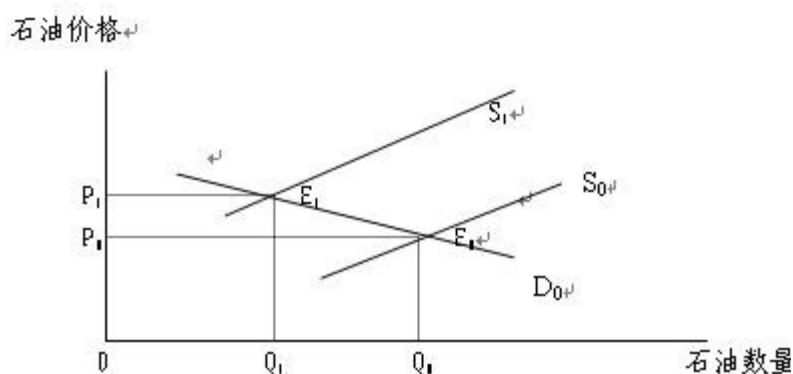


图 2—22 (b) 欧佩克长期内的合作不成功

例 2.12：对投机的评价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常用国民生产总值 GNP 来表示。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有两种方法，一是将最终产品的价值相加，也就是用于消费、基建、出口的产品（其中也包括服务）的总价值，而不包括中间产品的价值。二是将要素所得的价值相加，也就是将工资（以及各种资金、补贴）、利息、利润、租金相加。附带说一句用钱表示的价值如果存在着价格扭曲，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也跟着可能被扭曲。可见价格的重要性。按此计算方法，只要投机活动赚了钱，它就创造价值，因为这属于利润的一种。我们通常认为只有生产活动，或顶多再加上服务活动可以创造价值，为什么投机活动也能创造价值？要问答这个问题，先要对投机活动下一个定义。可以认为，不为从事生产和消费，只是为了赚钱而进行买卖的活动，都属于投机。这包括贩运、屯积、买卖期货商品、房地产和股票外贵金属等。可以肯定，仅当存在着价格差别时，投机买卖才有可能赚钱。例如商贩从价格低的地方贩运商品到价格高的地方；股票投机商在价格低时购进价格高时卖出。同样一种商品，由于地点不同和时间不同而有不同的评价，具有不同的价格，这是投机赚钱存在的前提。否则作为一个集团而言，投机商是不可能赚钱的。如果市场的条件没有变化，价格是稳定的。仅仅由于投机集体制造出价格的波动，那么投机集团内部赚的钱将等于赔的钱。他们不可能赚到集团之外的人的钱。但如果由于投机造成价格混乱而且集团之外的人受价格混乱的影响而在高价时参与抢购，则投机分子将能赚到集团之外的人的钱。然而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正常集团乘价格暴跌的机会超额购进，则投机集团将因之而赔钱。

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认为贩运是应当禁止的投机活动，到 80 年代初还认为长途贩运属于非法，使得地区之间不能货畅其流，各地的生产优势不能发挥。实际上，国际贸易正是一种跨国的长途贩运，它非但不应禁止，反而是应该大加鼓励的。懂得在空间上调剂余缺，能真正地节约生产成本，从而创造价值，也就不难了解在时间上调剂余缺同样能节约生产成本并创造价值。一个例子是农产品收割季节价格偏低，不利于生产者；青黄不接时价格偏高，不利于消费者。如果有人在价格低时购进，防止价格进一步降低；在价格高时售出，防止价格进一步上升，就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再一个例子就是电力在白天时供不应求，到了半夜供过于求。于是就有抽水蓄能电站，在半夜时收购电力，用提高水的位能的方法蓄存电力，到白天高峰负荷时出售电力，利用不同时间电价差别来赚钱。

从长远来讲，投机要能赚钱，非但必须存在时间上的价格差，还必须在低价时购进高价时售出。因此它必然能缓和价格的波动。因为低价时多了一个投机需求，可以防止价格进一步下跌；高价时多了一个投机供应，防止价格进一步上升。如果投机集团赔钱，必定是高价时购进，低价时售出，加剧了价格波动。

从这方面看，投机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并无本质差别，只要赚钱，都是对经济有利的。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都允许投机活动合法存在，过去美国政府对于短期股票买卖赚的钱要征较高比例的所得税，其隐含的依据是只有长期股票买卖才算是投资，才算是有利的。但这规定现在已经取消。意思是承认投机活动也有利于经济，应当一视同仁，当然投机买卖必须是公平自由的，不允许有欺诈存在，这和其他买卖也是一样的。

股票和房地产买卖赚了钱，究竟他们对经济作出了什么贡献呢？这种活动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准确的价格信号，使得其他有关的经济活动，可以准确计算出其盈亏结果。举例说，如果没有房地产投机市场，许多土地的价格将偏低，结果可能造成一些占地很大的生产活动占据了将来变为繁华商业地段的地面。由于土地投机，揭示了未来土地的价格，可以防止当初的错误决策。但如果房地产价格过高，则将阻碍当地经济的发展，投机商最后自己也会蚀本，这一点是房地产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房地产的过度投机，会形成泡沫经济。日本已大大地吃了亏。因为土地是各行业都要使用的，土地价过高，使一切成本上升。使得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降低。

资料来源：梁小民，《微观经济学纵横谈》，大众经济学，2000年。

例 2.13：中国粮食保护价政策及其后果

我国的粮食保护价政策是伴随着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和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而出台并不断发展的。经过 80 年代中期、90 年代初期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两次反复，政府逐步认识到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小规模生产条件下，放开市场，粮食具有生产下降或价格快速上涨的可能。为了稳定粮食生产，国家于 1994 年、1996 年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应该说这两次提价对稳定和发展粮食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提价幅度过大，不仅使国内粮食价格由原来低于国际市场转为高于国际市场，基本丧失国际竞争力，也使国内粮食生产与流通进入恶性循环：政府高价收购——粮食丰收——市场粮价走低——保护价收购——库存猛增——顺价销售困难——粮食陈化、低价处理——压低市场粮价——保护价收购，粮食供求严重失衡。

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从 1997 年开始国家实施以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由于保护价政策扭曲了市场供求信息及 1998 年以后的宏观经济疲软导致粮食生产比较效益相对提高，使粮食供求进一步失衡，市场粮价持续低迷，国有粮食企业仓容及政府财政补贴均不堪重负。1999 年仓储的粮食超过 2000 亿公斤，粮食库存总成本高达 2000 多亿元，保护价格政策成为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国务院在 1999 年 5 月中旬召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决定从 2000 年起适当缩小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范围，促使农民调整粮食种植结构、发展优质粮食生产。这一决定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的粮食保护价政策由此走上“选择保护”之路。

应该说“选择保护”比全部保护要前进了，然而这种保护价政策本身由于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体制下尤其是在开放的市场之下，其效果仍然是有限的，其政策成本是巨大的，其负面影响是深远的。

资料来源：黄雪琴，中国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效率分析与政策走向，《粮食经济研究》2003 年第 4 期。

例 2.14：票贩子为什么屡禁不止？

春节前夕，坐火车回家的人可能都有切身体会。火车票总是那么紧张，要提前排队购买，如果实在买不到，也可以想办法从票贩子手中高价购买。每年的这个时候，各地公安部门都会出动警力进行打击，但票贩子们总是屡禁不止。其原因实际不是公安部门打击不力，而是限制价格的作法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

均衡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如果铁路部门确定的火车票低于均衡价格，坐火车的需求量就大于供给量，这时存在价格上升的压力。随着价格上升，需求量（想坐火车回家的人）减少，供给量不变，价格就会上升到供求相等的均衡水平。反之，如果铁路部门确定的价格高于均衡价格，需求量小于供给量，价格下降，直至供求相等。当价格达到均衡时，想坐火车回家的人得到了满足，这就是实现了经济学家所说的资源配置最优化。

但是，如果受到外力的干预，价格就无法起到这种调节作用。比如，假定坐火车的均衡价格应该是 60 元，但物价部门规定的限制价格是 30 元。由于价格低于均衡价格，且不能上升，必然存在超额需求或供给短缺。火车票为 30 元时许多人买不到回家的票正是这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供小于求的方法有三种：配给（由铁路部门决定给谁）、排队（按先来后到的原则）和黑市。票贩子和买票人之间的交易是黑市交易。票贩子或者拉帮结伙装作乘客排队买票，或者与铁路有关人员勾结把紧缺的车票弄到。然后以供给不增加情况下黑市的均衡价格（比如 100 元）卖给真正需要火车票的人。只要存在限制价格，票贩子倒票有利可图，无论怎样“严打”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钻价格政策的空子是票贩子的理性行为。

显然，票贩子的存在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又损害了生产者(铁路部门)的利益。购票者不得不付出高价，这种高价又不由铁路所得。在我们的例子中，限制价格为 30 元，买票却付出了 100 元，其间差额 70 元就归票贩子及其同伙（例如，提火车票的人）所得到。有关部门制定限制价格的意图也许是在于维护消费者利益，但实际却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就在于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人为地破坏了价格自发地调节供求的作用。